

第貳章 守勢現實主義的理論

第一節 現實主義理論的演變

現實主義的思想源遠流長，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400 年Thucydides 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接著有Niccolo Machiavelli的《君王論》(The Prince)、Thomas Hobbes、George Hegel等等的學說，在不同的時代皆各有不同的詮釋與闡述，奠定了國際關係現實主義的理論基礎。¹而現實主義隨著當代國際關係的發展與變化，也有了新的修正與轉變。所以，現實主義不是只有單一的理論，而是在現實主義典範的架構下有多種的理論，²只是這些理論學派在層次分析、權力運作、政策影響力和決策者角色等問題互有觀點差異。³雖然如此，現實主義對於國際政治的本質都有以下共同的基本假定 (assumption)：

第一、國家中心論：這是各現實主義學派最沒有爭議的一點，並非現實主義忽視國際組織、跨國企業與個人的存在，而是上述單位要發揮影響力仍須透過國家或受到國家的支配，⁴國家仍是國際政治最主要的行為者。

第二、國際政治處於無政府狀態：無政府狀態並非表示混亂或無秩序的意涵，而是指國際上缺乏一個位居於國家之上、可以維持秩序的中央權威。⁵所以，國家必須仰賴自力更生以保障自我的安全與福祉，自助是無政府狀態下必然的行動原則，⁶所謂「天助自助者也」(God helps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

¹ 關於此點石之瑜有批判性的思考，見石之瑜，〈現實主義國際政治學的知識脈絡〉，《問題與研究》，第 39 卷，第 7 期（2000 年 7 月），頁 39-45。

² James E. Dougherty and Robert L. Pfaltzgraff, Jr., *Contending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comprehensive Survey*, 5th edition (New York: Longman, 2001), p. 63.

³ 鄭端耀，〈國際關係攻勢與守勢現實主義理論爭辯之評析〉，《問題與研究》，第 42 卷，第 2 期（2003 年 3/4 月），頁 3。

⁴ Stephen Krasner, *Structural Conflic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p.28.

⁵ Mearsheimer, "The False Promise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pp. 9-10.

⁶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1979), p. 111.

第三、國家尋求權力或安全的最大化：有些現實主義者強調國家以追求權力為目標，有些強調以追求安全為目標，權力只是手段，其差異將在下文中討論。但無論如何，現實主義者都同意國家最基本、最重要的目標就是——求生存，⁷無論是追求權力或安全，都是為了國家的生存與發展。

第四、國家會使用武力以確保目標的達成：國家以自助原則獲取生存，最終會採建立軍備的途徑，以武力去威脅敵人或保護自身的利益與安全。然而，若每一國家都以建立軍備的方式來對付其他國家，則會導致軍備競賽，造成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的產生。⁸

第五、國家是理性的行為者：國家在行動之前，會先計算利益與成本，採取理性的政策以達到權力或安全的目標。⁹只是國家因為情報不足或偏好的影響，難免會出現誤判或被誤導的情形。

第六、國際結構尤其是權力的分佈，影響國際政治的運作與國家的對外關係：現實主義不否認國家層次所扮演的角色，但認為體系層次是最重要的決定因素，¹⁰只是不同學派對國家層次與體系層次的重視程度不同，此將在下文作探討。

國際政治中的現實主義，首先分為古典現實主義與結構現實主義兩派：¹¹古典現實主義認為對權力的追求根植於人性之中，國家會不斷地追求權力的最大化，並以單位層次分析（unit level of analysis）的方式來解釋

⁷ Robert Gilpin, "No One Loves a Political Realism," *Security Studies*, Vol. 5, No. 3 (Spring 1996), pp. 7-8.

⁸ 安全困境是指一國為了安全會加強軍備，卻造成鄰國的不安也加強軍備以為反制，結果國家反而更不安全，見John H. Herz, "Idealist Internationalism and the Security Dilemma," *World Politics*, Vol. 5, No. 2 (January 1950), pp. 157-180.

⁹ 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p. 9-11.

¹⁰ Sean M. Lynn-Jones and Steven E. Miller, "Preface," in Michael E. Brown, Sean M. Lynn-Jones, and Steven E. Miller, ed., *The Perils of Anarchy: Contemporary Realism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5), p. x.

¹¹ 古典現實主義的代表為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fifth edition (New York: Knopf, 1978).結構現實主義的代表為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國際政治的結果；結構現實主義則認為，權力只是一種手段而非目的，國家的目的在於安全，主張要從體系層次（system level of analysis）著手，分析無政府狀態與權力的分佈對國家行爲的影響。¹²

冷戰時期美蘇兩強的對峙，使結構現實主義成爲國際關係理論的主流。然而，冷戰的和平落幕，結構現實主義者被批評未能有效地解釋蘇聯解體與從東歐撤軍的原因，使其理論受到強烈地質疑。¹³現實主義受到來自外部如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的挑戰。¹⁴然而，許多激烈但具啓發性的爭論卻是來自於現實主義內部，¹⁵形成了攻勢現實主義（offensive realism）與守勢現實主義的辯論。兩派理論皆從結構現實主義的基本假設出發，即在國際無政府狀態下，國家以追求安全爲首要的目標，但兩派對於國際無政府狀態的性質、國家對無政府狀態的反應、以及如何獲得安全的方式等問題上意見不一致。¹⁶

攻勢現實主義認爲國際的無政府狀態是霍布斯式的（Hobbesian）：由於國際上缺乏中央政府的存在，導致和平是少見的，衝突與競爭才是常態，國家不能確知彼此的意圖，因此爲了安全必須追求自身權力的最大化。如攻勢現實主義的代表學者John J. Mearsheimer所言：「國家最初的動機是防禦性的，但國際體系的結構迫使國家去作攻擊性的思考，有時則是

¹² 關於古典現實主義與結構現實主義的分別，見Robert Gilpin, "The Richness of the Tradition of Political Real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38, No.2 (Spring 1984), pp. 287-304; Kenneth N. Waltz, "Realist Thought and Neorealist Theory," in Charles P. Kindleberger, ed., *The Evolution of Theor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lumbia: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1991), pp. 21-38.

¹³ Dougherty and Pfaltzgraff, *Contending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 93.現實主義學者的回應與解釋是，由於前蘇聯面臨了外在物質的壓力與全球生產結構的變化，因此影響了決策者思維的轉變，進而導致冷戰的終結，但過去對這方面的資訊缺乏而無從得知，見Stephen G. Brooks and William C. Wohlforth, "Power, Globalization,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Reevaluating the Landmark Case for Idea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5, No. 3 (Winter 2000/01), pp.5-53.

¹⁴ Benjamin Frankel, "Restatement the Realist Case: An Introduction," in Benjamin Frankel, ed., *Realism: Restatement and Renewal* (London: Frank Cass, 1996), pp. xii-xiii.

¹⁵ Jeffrey W. Legro and Andrew Moravcsik, "Is Anybody Still a Realism?"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4, No. 2 (Fall 1999), pp. 5-12.

¹⁶ 于鐵軍，〈進攻性現實主義、防禦性現實主義和新古典現實主義〉，《世界經濟與政治》（北京），第5期（2002年5月），頁31。

採取攻擊性的行動。」¹⁷國際結構的壓力會使處境相似的國家採取類似的行爲，而不論國家之間的內部有何差別。因此，要衡量一國的行爲，需先檢視其相對實力與外部環境，導致其決定採取何種外交政策來達到最大的利益。¹⁸所以，攻勢現實主義繼承傳統現實主義的觀點，對於國際政治的看法是屬於悲觀的（pessimistic）。

守勢現實主義則有「樂觀的現實主義者」（realists as optimist）之稱，¹⁹主張國際結構是良性的，因為國家瞭解到向外擴張會受到其他國家的制衡，最終難免於失敗的下場。國家經過歷史經驗的教訓，會採取謹慎、溫和與自制的政策，²⁰因此國際安全是充足的，國家之間的合作是可能的，只有認知到攻擊占優勢時才容易使用武力。所以，守勢現實主義認為，外交政策是一個理性的國家對外在環境適當的反應，衝突與戰爭大多發生在認知（perception）錯誤的時候。如守勢現實主義的代表學者Stephen Van Evera所指出的：「（國際的）權力結構本身是良性的，所導致的戰爭也很少，但是被認知的權力結構常常是惡性的，可以解釋許多戰爭的發生」。²¹

可以說，攻勢現實主義與守勢現實主義最大的異同在於，兩者皆同意權力是確保國家生存的方式，只是對於需要多少權力才足夠的看法不同；也就是說，兩者都同意國家所追求的目標是安全，只是在作法上有所不同。²²攻勢現實主義著重於國家的攻擊性策略，而守勢現實主義則強調國家的自我防禦。本文將攻勢現實主義與守勢現實主義理論的其他差異之處列於表 2-1。²³

¹⁷ Mearsheimer, "The False Promise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p. 21.

¹⁸ Gideon Rose, "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 *World Politics*, Vol. 51, No. 1 (October 1998), p. 149.

¹⁹ Glaser, "Realists as Optimists."

²⁰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p. 51.

²¹ Van Evera, *Cause of War*, p. 6.

²² Yuan-kang Wang, "Offensive Realism and the Rise of China," *Issues & Studies*, Vol. 40, No. 1 (March 2004), p. 177.

²³ John J. Mearsheimer認為Waltz屬於守勢現實主義，由於其主張權力平衡與對維持現狀的偏好，

表 2-1 守勢現實主義與攻勢現實主義之差異

	守勢現實主義	攻勢現實主義
國家安全	持盈保泰、守勢防禦	擴充權力、主動進擊
嚇阻效用	威脅平衡建立在嚇阻的假設上，以嚇阻迫使對手三思	嚇阻也是一種手段，國家權力才是最主要的基礎。
敵友關係	國家可以透過對外政策相互溝通，區分意圖與敵友關係	國家真正的意圖是不確定的，沒有敵友是非，只有利害衝突
國際合作	當競爭風險較大時，國家願意合作以維護彼此利益	不否定國際合作，但認為是暫時性的，隨國家利益而改變

資料來源：整理自鄭端耀，〈布希政府安全戰略發展評析〉，《遠景基金會季刊》，第 4 卷，第 2 期（2003 年 4 月），頁 8-9。

另外，新古典現實主義（neoclassic realism）也是近年來崛起的國際關係理論。新古典現實主義對古典與結構現實主義的理論加以修正，不同意結構現實主義以安全為國家的目標，也不同於早期古典現實主義以為權力是人性的目標，而認為國家追求多元的目標與影響力。²⁴新古典現實主義不像攻勢或守勢現實主義對無政府狀態採取悲觀或樂觀的看法，而認為是不確定的，因此要評估決策者的認知以及國內政治對外交政策制訂的影響，²⁵這點與守勢現實主義有某種程度的相通。²⁶所以，新古典現實主義與結構現實主義的主要差異在於分析層次上，而不論是新古典現實主義或結構現實主義，都含有攻勢現實主義或守勢現實主義的因素，²⁷因此，為了理論的一致性與可區別性，新古典現實主義不在本論文的討論範圍之內。

見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W. W. Norton, 2001), pp. 19-20.

²⁴ Lynn-Jones and Miller, "Preface," p. xii.

²⁵ Rose, "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 pp. 152-153.

²⁶ 鄭端耀，〈國際關係攻勢與守勢現實主義理論爭辯之評析〉，頁 3。

²⁷ 關於結構現實主義、新古典現實主義、攻勢現實主義與守勢現實主義的異同與區別，見 Taliaferro, "Security Seeking under Anarchy," pp.132-135.

第二節 守勢現實主義的理論

守勢現實主義接受現實主義的假定，如國際結構的無政府狀態、權力分佈決定國際體系的運作與行爲，但是卻有不同的強調重點。守勢現實主義認爲，結構現實主義與攻勢現實主義主張在無政府狀態下，只會導致國家競爭的推論是不完全的，無法解釋國際上曾出現過的合作現象，因爲即使在冷戰期間，美蘇也有合作裁減核武的例子出現；²⁸此外，兩者只重視體系層次的分析，忽略了單位層次的分析以及決策者的認知因素，使其解釋的能力不夠完整。因此，守勢現實主義針對現實主義的缺點作修正，本文將其理論的論點與脈絡更清楚地陳述如下：

第一、守勢現實主義認爲國際結構是良性的，國際安全是充足的：因爲國際政治權力平衡法則的運作，²⁹國家向外侵略會導致其他國家的制衡，所以確保安全的最佳方式是採取防禦性的策略，或者說是旨在維持現狀的策略，因此有學者以爲守勢現實主義帶有一種「維持現狀的偏見」（*status-quo bias*）。³⁰其實，守勢現實主義假定國家爲理性的行爲者，在正常的情況下不會輕易挑起戰端，可說是一守勢的行爲者（*defensive actor*）。³¹然而，這不代表戰爭就不會發生，如果一個國家採取不顧後果的態度發動戰爭，那麼應該從單位層次而不是結構層次去尋找原因，所以守勢現實主義強調國內政治與認知因素的重要性。³²

第二、守勢現實主義承認安全困境的存在，但並非是不可解的難題：

²⁸ 自 1969 年起，美、蘇兩國開始限制戰略武器談判（The Strategic Arms Limitations Talks, SALT I），至 1972 年兩國第一次簽訂有關核武限制的條約，見 George H. Quester, *Offense and Defense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1977), pp. 202-204.

²⁹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 116-123.

³⁰ Randall L. Schweller, "Neorealism's Status-Quo Bias: What Security Dilemma?" *Security Studies*, Vol. 5, No. 3 (Spring 1996), pp. 90-121.

³¹ 關於國家守勢的行爲與策略，見 Joseph M. Grieco, "Realist International Theory and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 in Michael W. Doyle and G. John Ikenberry, eds., *New Thinking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97), pp. 166-168.

³² 關於國內政治的影響，見 Snyder, *Myths of Empire*; 關於認知的影響，見 Van Evera, *Cause of War*; also see Van Evera, "Offense, Defense, and the Causes of War."

雖然國際結構是良性的，但在某些特定情況下，如攻擊較有利時，即便同樣以安全為目標的國家，也會因安全的困境而發生衝突；但在多數情況下，國際體系是平穩的，安全困境的問題並不嚴重，³³國家的軍事動員主要是對付某些體系產生的特定威脅。雖然安全困境是一個難題，但是處於自助體系中的國家，可以選擇合作的方式來緩和；國家會在軍備競賽與武器管制（arms control）的利害中作衡量，如果雙方意識到軍備競賽是降低而非增加國家安全的話，他們就會採取合作，達成武器管制的協議。³⁴因此，安全困境不必然總是會導致衝突。³⁵

由於在國際無政府狀態下，競爭的風險高於合作，使得國家反而會尋求合作的可能。但是守勢現實主義主張國家之間的合作，並不像新自由主義主張要透過國際制度的建立才能夠達到，也不同於攻勢現實主義注重國家的相對利益（relative gains）而認為合作很難實現。守勢現實主義認為國家要達成合作的可能，最主要還是取決於對彼此意圖的判斷。³⁶

第三、國家可以溝通合作的意圖，以消弭對彼此意圖的不確定性（uncertainty）：守勢現實主義認為國家的意圖可以相互溝通，雖然國際社會不乏意圖擴張的國家可能會採取欺騙的策略，以鬆懈他國的防備而藉機牟取利益，但有些行為是侵略國所不會採行的，因為要付出高昂的代價，只有真正維護現狀和追求安全的國家才會付諸實行，例如武器管制（arms control）、單邊的防禦（unilateral defense）或自我抑制（unilateral restraint）的軍事政策，即所謂的「昂貴信號」。³⁷因此，國家真正的動機就可以表現

³³ Barry R. Posen, *The Sources of Military Doctrine: France, Britain, and Germany Between the World War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68.

³⁴ Glaser, "Realists as Optimists," pp. 52-53.

³⁵ Taliaferro還強調結構修正因素（structural modifiers）對安全困境的緩和作用，如攻守平衡（offense-defense balance）、地理鄰近與原料取得的管道等等，見Taliaferro, "Security Seeking under Anarchy," pp. 136-141.

³⁶ Robert Jervis, "Realism, Neoliberalism, and Cooperati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4, No. 1 (Summer 1999), pp. 49-55.

³⁷ Glaser, "Realists as Optimists," p. 68; 關於昂貴信號，見James D. Fearon, "Threat to Use Force: Costly Signals and Bargaining in International Crises,"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出來，而克服了對彼此意圖的不確定性。³⁸

是故，儘管國際結構有重大的制約作用，國家的政策與行爲也可以改變國際關係的運作：守勢現實主義重視外交政策在國際關係中所扮演的角色，國家的政策行動可以緩和或甚至改變國際行爲，使國際關係有更多的選擇與變化；亦即國際政治的運作不僅受到權力分配的影響，也受到國家的政策與行爲影響。³⁹而國內政治與領導者的認知因素，皆會影響一國外交政策的制訂，這點將在下文詳加討論。

第四、守勢現實主義強調認知與國內政治的重要性：既然國際結構是良性的、國際安全是充足的、安全困境的問題可以減緩，那麼爲什麼國際上還會有戰爭發生？守勢現實主義認爲必須從領導者的認知與國內政治的因素來尋找原因，因爲兩者對於國家行爲與外交政策的形塑和限制，皆有相當大的影響力。⁴⁰所以，除了體系層次的分析外，守勢現實主義也重視對單位層次與決策者認知的分析。前述Jack Snyder對國家擴張的研究、以及Stephen Van Evera對錯誤認知的探討，即爲顯著的例子。

第五、守勢現實主義主張以威脅平衡（balance of threat）來修正結構現實主義的權力平衡：守勢現實主義以爲，國際權力分佈的不均並非造成安全威脅的最主要原因，威脅實際上來自具體的目標，包括威脅的對象、國家權力、地理鄰近、攻擊能力以及侵略意圖。所以，外來的威脅是導致國家相互結盟以作爲制衡的最重要原因，彼此的意識型態、經濟誘因或政治因素，皆不是國家結盟的最重要考量。⁴¹

最後，守勢現實主義提出攻守理論（offense-defense theory），認爲攻

Berkeley, 1992), chap. 3.

³⁸ Andrew Kydd, "Sheep in Sheep's Clothing: Why Security Seekers do not Fight Each Other," *Security Studies*, Vol. 7, No. 1 (autumn 1997), pp. 116-119.

³⁹ 鄭端耀，〈國際關係攻勢與守勢現實主義理論爭辯之評析〉，頁 11。

⁴⁰ Taliaferro, "Security Seeking under Anarchy," pp. 141-143.

⁴¹ 威脅平衡還將權力平衡對國家權力的評估包括在內，見Walt, "Alliance Formation and the Balance of World Power;" and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擊與防禦之間的消長，對國際政治上衝突與戰爭的產生有深遠的影響。⁴²攻守理論主張：在國際結構的無政府狀態下，國家必須以自助的方式來確保安全，通常會加強軍事能力以達到安全最大化，主要策略有攻擊以及防禦兩種。當攻擊佔優勢時，容易導致戰爭與衝突的發生；當防守佔優勢時，則容易產生和平與合作。攻守理論有兩項基本的變數：(1) 攻守平衡 (offense-defense balance)：決定是攻擊容易或防守容易；(2) 攻守區分 (offense-defense distinguishability)：區別攻擊性的武器與政策以及防禦性的武器與政策。⁴³

首先，攻守平衡是指一國為抵銷敵國投入在防禦的資源而投入在進攻上的資源數量，形成攻擊／防守的成本比率 (ratio)。⁴⁴當攻擊所付出的成本大於防禦時，國家會採取防衛的政策；反之，當攻擊有利可圖時，國家會決定發動戰爭。⁴⁵所以，國家為了安全，會在攻擊較容易時採取攻勢的策略來對付威脅國，當防守較容易時，則不用擔心對方的侵略而產生和平。⁴⁶攻守平衡會決定一國採取攻擊或防禦的安全戰略，也影響其國際政治的行為模式與國家的外交政策。因此國家在制訂政策時，會將對攻守平衡的認知列入考量，使攻守理論對國家的外交政策較具有解釋力。⁴⁷

其次，攻守區分將攻擊性與防禦性武器分別開來，可以防止影響國際合作的作弊 (cheating) 問題，使國家能夠區別軍備競賽與武器管制，而有利於解決安全的困境。如此一來，國家可以只採防禦性的武器和政策，與其他國家就裁軍以及武器管制共同合作；或者運用信心建立措施 (confidence-building measures, CBMs)，來避免誤判彼此意圖、而導致緊

⁴² Ted Hopf, "Polarity, the Offense-Defense Balance, and War,"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5, No. 2 (June 1991), pp. 475-493.

⁴³ Jervis, "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⁴⁴ Sean M. Lynn-Jones, "Offense-Defense Theory and Its Critics," *Security Studies*, Vol. 4, No. 4 (Summer 1995), p. 665.

⁴⁵ Charles L. Glaser and Chaim Kaufmann, "What is the Offense-Defense Balance and Can We Measure I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2, No. 4 (spring 1998), pp. 49-51.

⁴⁶ Van Evera, *Cause of War*, chap. 6; Van Evera, "Offense, Defense, and the Causes of War," pp. 5-43.

⁴⁷ Lynn-Jones, "Offense-Defense Theory and Its Critics," pp. 660-661.

張情勢的發生。⁴⁸是故，守勢現實主義認為不一定要透過新自由主義所強調的國際制度形式，國家就有達成合作的可能。

至於使攻守平衡產生變化的因素，學者各有不同的定義。廣泛來說，包括地理、資源累積、民族主義、民心向背（regime popularity）、同盟表現（alliance behavior）、軍隊規模、軍事準則（military doctrine）與軍事部署等等。但是，所有學者都同意，影響攻守平衡最主要的關鍵在於科技的演變。⁴⁹軍事科技的演化會影響一國的軍事能力，而造成征服容易或防守容易的情形。

雖然攻守理論是守勢現實主義提出的重要理論，用來解決安全困境的問題，但其在實踐上卻有許多問題，學者對於區分攻擊性與防禦性武器的標準也有所爭議。⁵⁰然而，比較起能為國際政治所帶來的貢獻，攻守理論值得學界更進一步的研究與應用⁵¹。由於本論文並沒有應用到攻守理論，所以只在此略作介紹。

⁴⁸ Glaser, "Realists as Optimists," pp. 60-67; Glaser強調國家採取武器管制與自我抑制等軍事政策的作法，即屬於信心建立措施中的「限制性措施」(constraint measures):指對可能引起其他國家緊張、猜忌之武力部署或軍事行動加以限制的作為，見M. Susan Pederson and Stanley Weeks, "A Survey of Confidence and Security Building Measures," in Ralph A. Cossa (ed.), *Asia Pacific Confidence and Security Measures*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1995), pp. 85-86, 94-96.

⁴⁹ Keir A. Lieber, "Grasping the Technological Peace: The Offense-Defense Balance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5, No. 1 (Summer 2000), p. 76

⁵⁰ 關於對攻守理論的批評，可見Jack S. Levy, "The Offensive/Defensive Balance of Military Technology: A Theoretical and Historical Analysi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28, No. 2 (June 1984), pp. 219-238; Lieber, "Grasping the Technological Peace" pp. 71-104.

⁵¹ Glaser and Kaufmann, "What is the Offense-Defense Balance and Can We Measure It?" pp. 81-82.

第三節 對守勢現實主義的批評與回應

守勢現實主義理論的提出，是爲了要修正傳統現實主義的不足，使其更具解釋力，然而本身卻也受到了許多批評，特別是來自現實主義的內部，⁵²但是現實主義的研究傳統已藉由學理上的辯論而得到精進。爲了能更深入瞭解守勢現實主義的論點，及其與其他現實主義理論的差異，本論文以Jeffrey W. Taliaferro (2000) 的文章爲主，從三個面向來探討對守勢現實主義的批評及其回應與辯護：

第一、國家擴張的原因與單位層次的分析：Fareed Zakaria質疑守勢現實主義認爲國際安全是充足的，大多數的國家都是現狀的維持者，都只追求國家最起碼的安全；因此，只有領導人認知錯誤或盲目追求擴張的病態（pathological）國家才會進行侵略，如此一來，則將國家擴張、衝突與戰爭的原因，都放在單位層次來探討，而忽略了體系層次的分析，違反了結構現實主義對體系的重視。⁵³

與Zakaria的批評相反的是，守勢現實主義反駁說，國家在無政府狀態下最起碼（at minimum）都會追求生存，這個前提並不會排除國家擴大安全需求的行爲、或追求其他非關安全的目標。此外，守勢現實主義並非只著重在單位層次的分析，一些結構性的修正因素（structural modifiers），例如軍事科技的攻守平衡、國家的地理鄰近位置等等，也會使安全困境的情形產生變化，進而導致戰爭的發生。所以，在某些情形下如果國家只有擴張才會得到安全的話，於是就會進行擴張的行爲。⁵⁴

第二、認知與物質權力（material power）的作用：Jeffrey Legro及Andrew Moravcsik認爲國家爲理性的行爲者是現實主義的基本假定，他們批評守勢

⁵² Taliaferro, "Security Seeking under Anarchy," p. 132.

⁵³ Fareed Zakaria, *From Wealth to Power: The Unusual Origins of America's World Rol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22-23, 25-31.

⁵⁴ Taliaferro, "Security Seeking under Anarchy," p. 152.

現實主義重視領導者的信念以及對物質權力的認知，如此一來，將使現實主義的中心概念——權力，被主觀的認知取而代之，於是現實主義理論的簡約性（parsimony）與連貫性將受到衝擊。⁵⁵

Jeffrey W. Taliaferro則反駁說，首先，守勢現實主義並沒有忽視物質權力關係的重要性，一國的外交政策與國際政治的結果，主要是受到國際結構上權力分配的影響；從長遠方面來看，國際權力的相對分佈影響了國家互動，但是從短期來說，國家的決策機制形塑了其對外政策、經濟、安全戰略所追求的目標。所以，物質權力對國家對外行為的影響，必須透過決策者中介的認知與評估來理解。其次，Legro與Moravcsik將現實主義誇大了為「理性主義」（rationalist），現實主義雖然預設國家為理性的行為者，但是國家有時也會有非理性或者誤判的行為出現，這也是現實主義一直在探討的主題。最後，他們忽視了對決策者的檢視，也具有在研究方法上的重要性；有時決策者的偏好也是影響政策選擇的因素。⁵⁶

第三、守勢現實主義與現實主義典範的衰退：批評者認為，守勢現實主義將國內因素納入考量，違背了現實主義的核心主張——國家是國際無政府狀態下單一的、理性的行為者；守勢現實主義拒絕了國家具有單一、固定的偏好，必須依靠單位層次的分析，來解釋國家各種不同的動機與目的，於是造成了現實主義理論的「退化」（degeneration）——必須仰賴其他與核心假定無關的輔助（auxiliary）假定，才能解釋新出現的事實或異例；⁵⁷此外，守勢現實主義對於認知的強調，使得當該理論無法解釋的個案出現時，便可以用認知的錯誤來解釋這些現象，成為無法證明為假（non-falsifiable）的理論。⁵⁸這樣的評判標準，是以Imre Lakatos的「科學

⁵⁵ Legro and Moravcsik, "Is Anybody Still a Realism?" p. 35.

⁵⁶ Taliaferro, "Security Seeking under Anarchy," pp. 154-157; 關於領導者因素的重要性，見Daniel L. Byman and Kenneth M. Pollack, "Let Us Now Praise Great Man: Bring the Statesman Back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5, No. 4 (Spring 2001), pp. 107-146.

⁵⁷ Legro and Moravcsik, "Is Anybody Still a Realism?" pp. 9, 22-23.

⁵⁸ 王元綱，〈樂觀的現實主義：國際關係守勢現實主義之評析〉，《國際關係學報》，第18期（台北：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2003年，即將出版）。

研究綱領方法論」(methodolog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s, MSRP) 爲判準的。⁵⁹

然而，Lakatos的理論模型本身就是有問題的，如果按照其標準來看，幾乎所有社會科學的理論都難以成立了；況且，現實主義本身就包含許多相互衝突的理論，彼此之間雖有基本共識，卻也有許多歧見。衝突的論述與歧異的結論，並不代表理論的退步；而某一個理論的失敗，亦不代表現實主義典範的全盤皆輸。⁶⁰此外，批評者認爲現實主義借用了自由主義、建構主義、或是制度主義的理論，使得現實主義不再是現實主義了；⁶¹但是，理論之間的相互借用本就不足爲奇，重點在於對原理論是否有補強的效果，使其變得更完善。⁶²最後但最重要的是，真正應該要問的問題在於，無論有無符合Lakatos的標準，現實主義理論的轉變是否能夠幫助我們更瞭解這個真實的世界。

⁵⁹ Imre Lakatos, "Falsification and the Methodolog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mes," in Imre Lakatos and Alan Musgrave, eds., *Criticism and the Growth of Knowled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 pp. 91-196; John A. Vasquez以MSRP檢視現實主義理論的退化，引起一系列現實主義學者的回應與反駁，此一論戰皆發表在同一期的《美國政治科學評論》上，見Vasquez, "The Realist Paradigm and Degenerative versus Progressive Research Programs: An Appraise of Neotraditional Research on Waltz's Balancing Proposi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1, No. 4 (December 1997), pp. 899-912; Kenneth N. Waltz, "Evaluating Theories," *ibid.*, pp. 913-917; Thomas J. Christensen and Jack Snyder, "Progressive Research on Degenerate Alliances," *ibid.*, pp. 919-922; Colin Elman and Mariam Fendius Elman, "Lakatos and Neorealism: A Reply to Vasquez," *ibid.*, pp. 923-926; Randall L. Schweller, "New Realist Research on Alliances: Refining, Not Refuting, Waltz's Balancing Proposition," *ibid.*, pp. 927-930; Stephen M. Walt, "The Progressive Power of Realism," *ibid.*, pp. 931-935; 國內相關的探討見陳宏銘，〈現實主義典範的進步或退化：以Vasquez探Lakatos科學研究綱領的論戰爲焦點〉，《東吳政治學報》，第17期（2003年），頁53-91。

⁶⁰ Walt, "The Progressive Power of Realism," pp. 931-935.

⁶¹ Legro and Moravcsik, "Is Anybody Still a Realism?" pp. 22-45.

⁶² 王元綱，〈樂觀的現實主義〉。

第四節 維持現狀、嚇阻與昂貴信號

守勢現實主義主張國際結構是良性的、安全是充足的，很少會導致戰爭的發生，侵略國往往會受到其他國家的制衡。因此，本論文從守勢現實主義中推論出以下的論點：第一、國家保障自身安全的最佳策略是採取維持現狀的政策；第二、維持現狀的國家會採取防禦性的國防政策，因而更注重嚇阻的戰略；第三、現狀國會採取「昂貴信號」的作法透露其安全與合作的意圖，以避免不必要的衝突發生。接著，本節將針對上述論點的邏輯推論，做更進一步地解釋與說明：

一、維持現狀的政策

守勢現實主義主張，國家會採取維持現狀的策略以確保安全。所謂的維持現狀，旨在「維持某一歷史特定時期的權力分配之狀況」，如果稍微調整權力分配的政策，「能維持相關國家相對的權力位置於不墜，則可以稱之為維持現狀的政策」。⁶³

國家為何要採取維持現狀的政策呢？從一方面來說，最主要的原因是國家為了安全，必須要維持其在體系中的地位。⁶⁴因為在自助的國際無政府狀態下，國家會追求足以確保其安全與獨立的相對實力（relative power），因此可稱之為「位置採取守勢者」（defensive positionalist）。⁶⁵除了確保安全外，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國際上既有的權力關係對其有利，所以國家才會成為現狀的維護者，進而鞏固、保障既有的國際秩序；⁶⁶相對

⁶³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p. 46.

⁶⁴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 126.

⁶⁵ Grieco, "Realist International Theory and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 pp. 166-168; Grieco特別重視國際政治中國家相對利益（relative gains）的問題，also see Grieco, "Understanding the Problem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The Limits of Neoliberal Institutionalism and the Future of Realist Theory," in David A. Baldwin, ed., *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 The Contemporary Debat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303.

⁶⁶ A. F. K. Organski and Jacek Kugler, *The War Ledger*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 19-24; E. H. Carr, *The Twenty Years Crisis* (London: Macmillan, 1946), pp. 93-222, cited from Barry

於國際關係中的修正者或挑戰者（challengers），會對自身在體系中的權力地位感到不滿，而試圖改變現存的國際秩序以遂行所欲。⁶⁷因此，國家要採取維持現狀的政策，除了要確保體系中權力位置的平衡外，還要維護體系內的秩序，即國際秩序的現狀。正如Randall L. Schweller所言，自保以及維護既有的價值利益（self-preservation and protection of values），是現狀國所追求的目標。⁶⁸

此外，國際政治中權力平衡的特性，會使向外擴張的國家受到其他國家的制衡，進而導致失敗的命運，所以國家從歷史經驗中學習到征服往往會失敗，最佳的自保之道是採取防禦性的軍事政策。⁶⁹是故，一個滿足於既有的國際秩序、致力於現狀的國家，會審慎地評估自身政治、地緣與科技的位置與能力，實行最低風險與代價的軍事準則以維護國家利益，因而會採取防禦性或嚇阻性的國防政策，而不是攻擊性的軍事戰略，因為攻擊所要承受失敗的風險遠超過防禦。⁷⁰所以，Robert Jervis認為可以用一國採取攻擊性或防禦性的戰略來區分其為侵略國亦或是現狀國。⁷¹而嚇阻也是現狀國所會採取的防禦戰略，關於這點將在下文做詳細的探討。

Buzan, *People, State, and Fear: An Agenda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Boulder, Colo.: Lynne Rienner, 1991, 2nd edition), p.300.

⁶⁷ Morgenthau稱修正者為帝國主義（imperialism）的政策，見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p. 74. 關於國際關係中現狀維持者與修正者的探討，見 Schweller, “Neorealism’s Status-Quo Bias,” pp. 98-101; Johnston, “Is China a Status Quo Power?” pp. 6-12; Johnston 指出 Morgenthau 以及 Organski 與 Kugler 對現狀定義的不同之處：前者僅就權力分配的變化而言，後者則更重視秩序的層面，見 *ibid.*, p. 9, note 14.

⁶⁸ Schweller, “Neorealism’s Status-Quo Bias,” p. 99. Arnold Wolfers認為現狀強權（status quo Power）是指維護現有秩序，或放棄以武力來改變現有秩序的國家，見 Wolfers,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Theory and Practice,” in Wolfers, *Discord and Collaboration: Essays o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62), p. 125.

⁶⁹ Glaser區分攻擊性與防禦性的軍事政策：前者為單邊取向較具競爭性；後者強調雙邊取向，著重合作的面向，見Charles L. Glaser,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Military Strategy: Expanding and Refining the Spiral and Deterrence Models,” *World Politics*, Vol. 44, No. 4 (July 1992), pp. 498, 508.

⁷⁰ Barry R. Posen將軍事戰略區分為攻擊性、防禦性與嚇阻性，並認為維持現狀的國家會傾向防禦性或嚇阻性（懲罰性）的軍事戰略，是因為必須付出的代價較低之故，見Posen, *The Sources of Military Doctrine*, pp. 19, 69, and 74.

⁷¹ Jervis, “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pp. 199-200.

二、嚇阻戰略

嚇阻，簡單來說，是指：「勸阻敵人，使其瞭解到其行為所帶的代價與風險將超過獲益」。⁷² Snyder將嚇阻區分為阻絕(denial)與懲罰(punishment)兩種能力，前者重視傳統軍事的防衛面向，要降低侵略者所獲得的戰果；後者則著重於大規模或有限度核武的報復能力，以擴大侵略者入侵的代價。⁷³因此，嚇阻在理論上是一種影響敵國決策的行為，其用意在迫使對手做利益評估，深化考慮事後代價的心理衝擊，從而形成決策壓力，使對峙雙方維持現有的狀態；⁷⁴而要採取嚇阻的策略，除了必須考量其所展示的嚇阻姿態外，還要評估萬一嚇阻失效可能帶來的後果。

一般而言，嚇阻被視為防禦的一種形式，⁷⁵但是戰略核武的出現，使一般防禦無法有效地對付，於是嚇阻理論開始強調事後報復的作用，逐漸以懲罰取代防衛作為主要的嚇阻手段。⁷⁶在理論上，嚇阻與防禦被區分為兩種不同的概念：嚇阻是防衛者與侵略者之間互動的結果，是從嚇阻者與被嚇阻者的利益觀點思考軍事行動的後果。嚇阻主要用於承平時期的，在作為上較積極主動；防禦則是用於戰時，衡量嚇阻失敗後所要付出的代價，在作為上較消極被動。嚇阻著眼於降低敵人可能的軍事行動意圖，或不得已時採取的報復手段；防禦則著重於降低敵人的軍事行動所帶來的傷害，包括防止領土與戰爭的損失。⁷⁷

⁷² Alexander L. George and Richard Smoke, *Deterrence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Theory and Practic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4), p. 3.

⁷³ Glenn H. Snyder, *Deterrence and Defense: Toward a Theory of National Securit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1), pp. 14-15.

⁷⁴ 陳偉華，〈從「戰略嚇阻」論台灣『國防戰略』發展的兩難〉，《戰略與國際研究》，第2卷第4期（2000年10月），頁75。

⁷⁵ Karen Ruth Adams, "Attack and Conquer? International Anarchy and the Offense-Defense-Deterrence Balanc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8, No. 3 (Winter 2003/04), p. 48. Adams將嚇阻從攻守平衡中獨立出來，成為攻守嚇阻理論，見ibid., pp. 45-83.

⁷⁶ Abram N. Shulsky, *Deterrence Theory and Chinese Behavior* (Santa Monica, Calif.: Rand, 2000), p. 18.

⁷⁷ Snyder, *Deterrence and Defense*, pp. 3-5.

雖然嚇阻與防禦在概念上可以截然劃分，但是在實踐上兩者之間存在著緊密的關聯：首先，充分的防衛能力足以影響敵人侵略的意圖，提高敵人發動戰爭後失敗的顧慮，因此有效地防禦本身即具有嚇阻的功效；其次，縱使防禦不完備，也能藉由報復來嚇阻敵人，然而，脆弱的國防也易遭受到敵人的反報復；再者，加強國防可以降低敵人攻擊的意圖，國家不需要強大的反擊能力也能存活；最後，如果嚇阻失效敵人入侵，依然可以運用防衛力量削弱或擊敗敵人，爭取戰爭的最後勝利。⁷⁸總之，嚇阻與防禦的目的都是希望能維護現狀、避免敵人的攻擊；只是嚇阻在政治上的目的是防禦性的，但是在方法上卻採取攻擊性的軍事手段。⁷⁹而不論是嚇阻還是防禦，都是現狀國會採取的軍事戰略。⁸⁰

此外，還必須要釐清的是嚇阻與威迫（*compellence*）兩者的不同：嚇阻是要阻止對手採取某些作為；威迫則較具侵略性，用意在迫使對手放棄某些已實踐的行為或價值理念。前者是被動地維持現狀，對手一旦有所行動將受到處罰；後者則帶有主動地強制性質，目的在運用各種手段迫使對手改變現狀。⁸¹一般來說，威迫要比嚇阻的難度來得大。⁸²

是故，一個現狀國會採取防禦性的國防政策，不會輕易地向外擴張而挑起爭端；一旦有必要訴諸武力時，現狀國會優先採用嚇阻的戰略，以取代攻擊性的軍事行為。

⁷⁸ Patrick M. Morgan, *Deterrence: A Conceptual Analysis* (Beverly Hills, Calif.: Sage Publications, 1977), p. 30; 陳偉華，〈傳統嚇阻在理論上的辯證〉，《戰略與國際研究》，第3卷第2期（2001年4月），頁164。

⁷⁹ Avner Yaniv, *Deterrence without the Bomb: The Politics of Israeli Strategy* (Lexington, Mass.: Lexington Books, 1987), pp. 9-10.

⁸⁰ Robert Jervis對這方面作了許多探討，見Jervis, "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pp. 167-214; Jervis, "Deterrence Theory Revisited," *World Politics*, Vol. 31, No. 2 (January 1979), pp. 289-324

⁸¹ Thomas C. Shelling, *The Strategy of Conflic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pp. 195-196; Shelling, *Arms and Influen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6), pp. 69-72.

⁸² Jervis, "Deterrence Theory Revisited," p. 297. Alexander L. George提出以「強制外交」(coercive diplomacy)替代威迫的概念，強制外交旨在勸阻對手停止或改變其行為，較不具侵略性，見George, "Coercive Diplomacy: Defini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in Alexander L. George and William E. Simons, eds., *The Limits of Coercive Diplomacy*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94), p. 7.

三、昂貴信號的作法

現實主義認為，國際結構的無政府狀態造成國際政治的不確定性。⁸³這種不確定性主要是由於訊息的不對稱性（*asymmetric information*）——不同的國家對於相同的事件會有不同的解讀與信念，形成訊息的不對稱或不完全，使得一國永遠無法真正瞭解或全然相信其他國家的意圖與能力；⁸⁴此外，侵略國也可能藉著欺騙（*cheating*）來掩飾其真正的意圖。所以，國家為了安全會競相強化自身的軍備，造成相互威脅的狀況而形成安全的困境，即使是尋求安全的國家也會採取攻擊的行動，進而導致衝突與戰爭的爆發。⁸⁵正如Waltz所指出的：「不確定與誤判往往會導致戰爭的發生」。⁸⁶因此，一個現狀國如果為了自我防禦而採取嚇阻的策略，則有可能被其他國家誤認為是侵略國，導致衝突的更進一步擴大。

然而，這樣的觀點卻忽略了國家之間為了避免戰爭，可以和平地協商（*bargains*）之可能性與可行性。⁸⁷如果所有的國家皆滿足於現狀而不願使用武力，則國際社會就會像Rousseau所說的處於「獵鹿」（*Stag Hunt*）的狀態——國家會共同合作來追求安全，⁸⁸因而要解決的問題是彼此要如何有效地溝通協調。如此一來，國家沒有必要隱藏或誤導他國其真正的動機，反而願意對他國表現其良善的意圖，透過示意（*signaling*）或協商的方式避免誤判的情形發生。⁸⁹所以，守勢現實主義主張，國家可以採取「昂貴

⁸³ Michael Spirtas, "A House Divided: The Tragedy and Evil in Realist Theory," *Security Studies*, Vol. 5, No. 3 (Spring 1996), pp. 409-412.

⁸⁴ Robert Powell, *In the Shadow of Power: States and Strategie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9-12.

⁸⁵ Robert Jervis,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 62-67. Jervis稱之為「霍布斯式的螺旋」(Hobbesian spiral)，見*ibid.*, p. 62, note 10.

⁸⁶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 168.

⁸⁷ James D. Fearon, "Rationalist Explanations for Wa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9, No. 3 (Summer 1995), p. 385.

⁸⁸ 「獵鹿」的狀態建立在國家是理性行為者的前提下，關於其描述，見Kenneth A. Waltz, *Man, the State and the War: A Theoretical Analysi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9), pp. 167-171.

⁸⁹ Randall L. Schweller, *Deadly Imbalances: Tripolarity and Hitler's Strategy of World Conques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50-51.

信號」的作法來澄清彼此的意圖。

國家爲了溝通彼此的合作意圖，會採取武器管制、單邊防禦或自我抑制等信心建立措施的政策，以作爲「昂貴信號」的表示。⁹⁰所謂的「昂貴」(costly)在於，一國所採取的示意行爲，會使其打退堂鼓的代價提高，而更不願意背信或恣意地訴諸武力的使用。因此當危機發生時，立場堅定的國家會採取「昂貴信號」的作法以展現決心，也避免了直接訴諸於戰爭的手段。⁹¹是故，守勢現實主義認爲，現狀國可以「昂貴信號」的作法展現維護現狀和追求安全的決心，藉以和他國溝通合作的意圖；而這些政策是企圖侵略的國家所不願採行的，因爲會降低其攻擊的能力與先機，也提供了現狀國有利於自我防衛的情報。

第五節 研究假設

本論文的主要假設 (prime hypothesis) 是：「冷戰後中共的外交政策符合守勢現實主義理論」。就守勢現實主義的理論而言，其有以下的特點：第一、守勢現實主義主張國際結構是良性的、安全是充足的；這點不同於攻勢現實主義認爲國際無政府狀態必然會導致衝突的看法。第二、守勢現實主義認爲國家冀望能夠維持現狀以保障安全，一旦只有擴張能夠增進安全，才會向外擴張，如果國家安全充足的話，就不會採取擴張的策略；⁹²相

⁹⁰ Glaser 強調軍事政策方面的「昂貴信號」，見Glaser, "Realists as Optimists," pp. 68-70；Kydd則認爲民主政體的決策過程較具透明度，並且擴大了「昂貴信號」的範圍，除了Glaser所提的國防政策與武器管制外，還將國家溫和的意識型態、對國內少數民族的政策、對弱小鄰國的政策，作爲衡量「昂貴信號」的指標，見Kydd, "Sheep in Sheep's Clothing", pp. 141-144；然而Taliaferro批評Kydd的標準，認爲溫和的意識型態可能純屬辭令 (rhetoric)，以及民主政體反而釋放出紊亂的訊息，見Taliaferro, "Security Seeking under Anarchy," pp. 145-152；本論文主要採納Glaser對「昂貴信號」的定義，並認爲其較符合信心建立措施的作法，因爲信心建立措施是要「以增加透明度與可預測性來使軍事意圖更清楚，藉以降低因意外或誤判而爆發戰爭的危險」，見Pederson and Weeks, "A Survey of Confidence and Security Building Measures," p. 82.

⁹¹ Kydd, "Sheep in Sheep's Clothing", p. 141.

⁹² Zakaria, *From Wealth to Power*, p. 22.

對於攻勢現實主義則強調國家爲了安全會尋求向外擴張，而不僅僅滿足於現狀。⁹³第三、守勢現實主義基本建立在嚇阻的假設上，不論是威脅平衡、權力平衡或防禦策略的主張，都是因嚇阻能發生效用；⁹⁴另一方面攻勢現實主義認爲權力才是最主要的憑藉，對嚇阻重視的程度並不如守勢現實主義。第四、守勢現實主義認爲，尋求安全的國家會採取昂貴信號的作法以透露其動機，而避免不必要的衝突發生，但是圖謀侵略的國家則不願付出採取昂貴信號的成本。⁹⁵

是故，爲了證明守勢現實主義與冷戰後中共安全政策的相關性，本論文推論出以下的解釋假設（explanatory hypotheses）來進行理論檢驗的工作：

假設 1：中共對國際環境的認知會符合守勢現實主義關於良性的國際結構與安全充足的觀點。

假設 2：中共的外交政策旨在維持既有的國際秩序，所以其對外的行爲會以維持現狀爲主，避免改變現狀的情形發生。

假設 3：中共的國防政策屬於防禦性的，因此其戰略會以嚇阻爲主，避免使用武力直接與敵人衝突。

假設 4：爲了表示其防禦性、維持現狀或者是合作的意圖，中共會採取昂貴信號的作法，以避免被其他國家所誤解。

上述假設可作爲衡量中共防禦性安全政策的指標（indicators），藉以觀察中共的政策作爲是否與守勢現實主義所預測的一致。⁹⁶假設 1 將從中共

⁹³ 擴張可分爲刻意（manual）與非刻意的（automatic），見Eric J. Labs, "Beyond Victory: Offensive Realism and the Expansion of War Aims," *Security Studies*, Vol. 6, No. 4 (Summer 1997), p. 12; John J. Mearsheimer則認爲國家爲了安全會追求擴張直到成爲霸權（hegemony），若無法成爲全球霸權則會設法成爲區域霸權，見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pp. 40-42.

⁹⁴ 鄭端耀，〈布希政府安全戰略發展評析〉，頁 8。

⁹⁵ Andrew Kydd, "Sheep in Sheep's Clothing," pp. 140-141.

⁹⁶ 若以自變數與依變數的關係來表示，則良性的國際結構屬於自變數，維持現狀、嚇阻與昂貴信號的行爲屬於依變數，關於自變數與依變數的關係，見Van Evera, *Guide to Methods for Students*

領導人的言論、政策宣示以及國防政策白皮書來加以分析；假設 2、3、4 則採用個案研究的分析途徑，在 1995-96 年的台海危機以及 90 年代以來中共在南海問題上的爭議分別來加以檢視。

小 結

綜觀現實主義的發展脈絡可以看出，守勢現實主義的出發點是希望能夠修正傳統現實主義的不足，使其更具有解釋力，並論證現實主義也可以是樂觀的。⁹⁷所以，守勢現實主義主張國家追求的是相對的安全而非絕對的權力，通常會採取較為溫和、維持現狀的安全政策；只有在特定的條件下，例如認知到安全不足或攻擊較占優勢時，才會採取攻擊性的向外擴張策略。因此，有學者稱守勢現實主義為「條件性現實主義」(contingent realism)。⁹⁸此外，攻守理論也能夠解釋國際上戰爭與衝突產生的原因，指出當國家衡量要採取攻擊或防禦時，著重的是國家的軍事科技與能力，而非只限於國家在國際結構下的權力分佈；因而將對權力分佈的評估轉變為對軍事能力的評估，增加了國家政策的選擇性。

最後，守勢現實主義主張國際結構是良性的、安全是充足的，因此，本論文推論出國家為了確保安全會採取維持現狀的政策；現狀國會採取防禦性的國防政策、注重嚇阻的作用；現狀國採取「昂貴信號」的作法透露安全與合作的意圖。本論文並以此作為檢視國家行為是否符合守勢現實主義的評估指標。是故，基於守勢現實主義的優越性，本論文選擇其作為分析冷戰後中共安全政策的理論基礎。

of Political Science, pp. 10-11.

⁹⁷ 王元綱，〈樂觀的現實主義〉。

⁹⁸ Glaser, "Realists as Optimists," p. 52.